

《庄子注疏》传本考述

丰子翔

内容摘要:《庄子注疏》主要版本举凡有七。雕版于南宋的魏岷本是存世最早的刻本,道藏本的文本由魏岷本的文本衍生而来。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四种日系传本的内容既有相似性又存在个性,符合日本旧抄本的文献特征。庆应义塾本是以魏岷本系统的文本为基础,参定其他版本而成。中野本虽为刻本,但其内容出自另一部日本旧抄本,文字多存抄本旧貌。杨守敬校刻的《古逸丛书》本是近代以来研治《庄子》的通行本,虽题为“覆刻”,但实际上是拼凑魏岷本、道藏本、中野本三本的内容,并加臆改而成的新读本。

关键词:《庄子注疏》 魏岷本 道藏本 日本汉籍 《古逸丛书》

古人撰写的《庄子》注释书,传世者以西晋郭象注为最早,其次则为唐代成玄英所撰的《庄子疏》。成玄英《庄子疏》单疏本已经亡佚,合编《庄子》正文、郭象注文、成玄英疏文而成的《庄子注疏》是整体保存成玄英《庄子疏》文本的唯一载体。

《古逸丛书》所收“覆宋本庄子注疏”,因较易得见,晚清以来即成为《庄子注疏》的通行本^①。但是《古逸丛书》对底本常有改动,其文本难以尽信^②,

①如被梁启超、胡适等认可的郭庆藩《庄子集释》(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83页。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读书杂志》1923年第7期),所引成疏的来源即为《古逸丛书》本(王孝鱼:《点校后记》,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第1110页)。中华书局《道教典籍丛刊》所收点校本《南华真经注疏》是目前最为通行的《庄子注疏》整理本,其底本亦为《古逸丛书》本。

②蒋鹏翔:《〈易程传〉的〈古逸丛书〉本与元至正本的关系》,《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第197-200页。马月华:《〈古逸丛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189页。王天然:《〈古逸丛书〉本〈穀梁〉的存真与失真》,《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56-164页。

而前人对《庄子注疏》传世版本的研究又皆为孤立个案^①,尚无法以版本系统为依据认识《古逸丛书》本的校改方法与得失。

近年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庆应义塾大学、静嘉堂文库陆续公布所藏《庄子注疏》书影,笔者以此为契机,汇校传世《庄子注疏》版本,以期探索《庄子注疏》的版本源流,并据以考察《古逸丛书》中“覆宋本庄子注疏”的内容质量。

一、《庄子注疏》传本述略

《庄子注疏》传世的版本不多,现根据目录学、版本学的调查结果,将各本的基础情况叙述如下。

(一)魏岷本与《古逸丛书》本

1.《南华真经注疏》十卷,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寿春魏岷刻本(以下简称“魏岷本”)。魏岷本仅存卷一、卷七至十,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魏岷本卷十之后原附有《庄子音义》,后在流传中与注疏主体分离,现日本天理图书馆尚藏有一部魏岷本所附《音义》^②。

魏岷本半叶八行,行十五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方记本叶字数,下方记刻工姓名。除序文外,左栏外上方有书耳,记篇名。避讳至宋宁宗“廓”字。卷中见“金泽文库”“赐芦文库”“宝宋阁珍赏”“向黄村珍藏印”“松方文库”“岛田翰读书记”六枚藏书印,可知此魏岷本曾辗转于金泽文库、新见正路(赐芦文库,1791-1848)、向山黄村(宝宋阁珍赏、向黄村珍藏印,1826-1897)、松方正义(1835-1924)、岛田翰(1879-1915)手中。

2.《覆宋本庄子注疏》十卷,清光绪十年(1884)遵义黎庶昌刻本,收入《古逸丛书》中(以下简称“《古逸丛书》本”)。黎庶昌在《古逸丛书·叙目》中介绍《古逸丛书》本的刊刻始末云:

此本(引者按:即魏岷本)为日本新见旗山所藏,字大如钱,作蝴蝶装,仅存十分之五。予见而悦之,以金币为请。新见氏重是先代手泽,不欲售,愿假西法影照上木而留其真。予又别于书肆中收得《养生主》一卷、《德充符》数叶,为新见氏所无,并举而归之。然尚缺《应帝王》以迄《至乐》,因取坊刻本成疏校订缮补,而别集他卷字当之,不足者命工仿写。盖极勾心斗角之苦矣。天下至大,设异日宋本复出,取以与此数

①据笔者所见,马鸿雁《郭象〈庄子注〉版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曾对魏岷本和道藏本有过讨论。杨守敬、市野光彦、涩江全善、岛田翰、长泽规矩也、蒋门马等人对不同《庄子注疏》的版本亦有解题式的介绍,以下皆随文征引。

②黄华珍:《庄子音义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第26-29页。

卷相校,字体多不类,读者当推原其故也。

据知《古逸丛书》本是以魏岷本为底本“覆刻”,魏岷本不存的篇卷,则改以其他版本中的内容为依据,并模仿魏岷本的版式、字体进行补刻。

《古逸丛书》本的外在形态基本与魏岷本同。例外者有三:其一,魏岷本中成玄英序文的版面无书耳,而《古逸丛书》本为其添置书耳以统一体例,记云“成序”。其二,《古逸丛书》本于新造版面的版心下方记“木村集字”,全书之末左栏下方署“日本东京木村嘉平刻”。其三,魏岷本避宋讳稍宽,“玄”字间或不缺,但《古逸丛书》本中的“玄”字因避清讳而皆严格缺笔。

(二)日系传本

3.《南华真经注疏解经》不分卷,日本室町时期(1336-1573)抄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以下简称“宫内厅本”)。

宫内厅本半叶八行,行十九字不等,注文双行同。卷首钤“松崎复”“辛卯明复”印鉴,可知宫内厅本原为日本汉学家松崎复(1771-1844)旧藏。

《经籍访古志》著录宫内厅本云:“旧钞本,石经山房藏……界长六寸五分,幅五寸二分。不记钞写时月。考纸质墨光,当在庆元以前矣。”石经山房为松崎氏藏书处,可知在《经籍访古志》此段文字撰写时^①,宫内厅本尚存于松崎氏家中。而昭和六年(1931)出版的《宫内省图书寮御藏版》已著录该本^②,则此本流入宫内厅书陵部的时间当在1855至1931年间。

4.《南华真经注疏解经》不分卷,日本室町时期抄本,藏于日本足利学校(以下简称“足利本”)。足利本中《大宗师》至《在宥》、《天道》至《达生》十三篇已散佚。

足利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不等,注文双行同。卷首钤“足利学校”印鉴。足利本书后有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闰八月,时任御书物奉行的近藤守重跋语,云“学校所藏‘庄子注疏’,系足利中叶古钞本”,又云“今以此古钞本使市野俊卿对校印本”。而近藤氏跋语之前则有市野光彦(字俊卿)撰于当年七月的跋语,详记此次校理始末:

今兹丙子夏(引者按:即文化十三年)正斋近藤君借足利学藏本,命仆校之,阙文讹字一一补正,则此书殆可读诵也……仆已喜得此本,遂取印本而补其缺,为函纳之以还之,庶几传之乎永葆而不朽矣。

①《经籍访古志》自1855年初稿本成书至光绪十一年(1885)徐承祖排印本问世之间,递有增益(参见杜泽逊、班龙门:《〈经籍访古志〉浅说》,《藏书家》第18辑,齐鲁书社,2014年,第109-117页)。其初稿本不著录宫内厅本,而光绪排印本著录,则《经籍访古志》著录宫内厅本的文字当撰写于1855年至1885年之间。

②宫内省图书寮编:《宫内省图书寮御藏版》,文求堂书店,1931年,叶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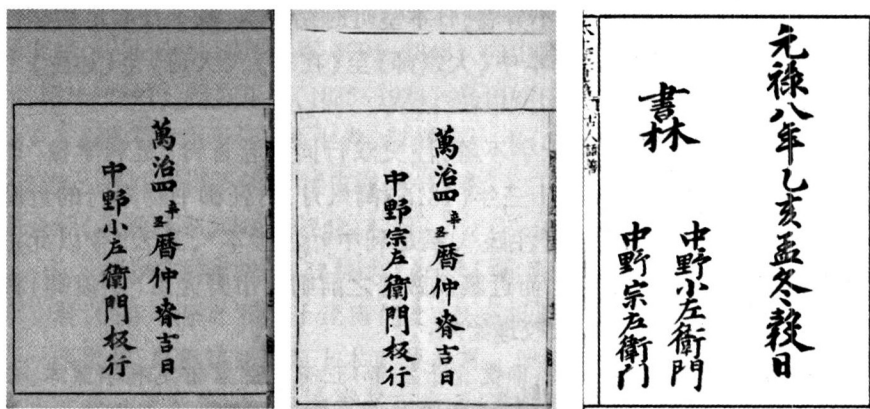
5.《南华真经注疏》不分卷,日本室町时期抄本,藏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以下简称“庆应义塾本”)。

庆应义塾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不等,注文双行同。书内钤“有不为斋”“残花书屋”“宾南”“庆应义塾图书馆藏”印鉴,可知该本曾经伊藤介夫(有不为斋,1833-1912)、户川安宅(残花书屋,1855-1924)、户川浜雄(宾南,生卒年不详,户川安宅之子)递藏。

6.《南华真经注疏解经》不分卷,日本万治四年(1661)中野小左卫门刻本(以下简称“中野本”)。核对足利本胶卷书影^①,市野光彦用以补配足利本的“印本”正是中野本。

中野本无栏线,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同。上栏外有天头,刻有摘录自林希逸《庄子觞斋口义》、陆德明《庄子音义》等书的参考资料。

传世各部中野本的“奥付”(书籍版本记录)内容并不相同,可分为两种。一种“奥付”题“万治四辛丑历仲春吉日中野小左卫门板行”(见图1A),另一种题“万治四辛丑历仲春吉日中野宗左卫门板行”(见图1B)。而在日本元禄八年(1695)和刻本《太上感应篇》的“奥付”中,“中野小左卫门”与“中野宗左卫门”二名并署(见图1C),据此情况推测,“小左卫门”与“宗左卫门”当为同一书坊中之两人。署“小左卫门”与“宗左卫门”的《南华真经注疏解经》除“奥付”处名氏有异之外,其余各处版片全同^②,故而统称“中野本”,不再做区分。



A “小左卫门”奥付

B “宗左卫门”奥付

C 和刻本《太上感应篇》奥付^③

图1

^①在以下网页可见:<http://www.homeinmists.com/ZhuangZi246.rar>。

^②对比时依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公布的两种中野本书影。奥付题“小左卫门”者的书号为“イ17-02074-1-11”,奥付题“宗左卫门”者的书号为“口13-00062-1-13”。

^③图片采自 <https://sanmitu.com/products/detail/6330>(日本三密堂书店所售书之书影)。

(三)道藏本及其衍生本

7.《南华真经注疏》三十五卷,明正统十年(1445)内府刻本,收入《道藏》中(以下简称“道藏本”)。道藏本为经折装,无栏线,行十七字。

道藏本虽分三十五卷,但内容并无显著增益。正统《道藏》的装帧形式为经折装,其校刻者将一册折本称为“一卷”,并在各册首端重新题写卷数^①。道藏本共三十五册,所谓“三十五卷”之数,即是《道藏》校刻者在以《庄子》三十三篇各装为一册的基础上,因《齐物论》《大宗师》两篇内容过长,又各拆分为两册所致。

道藏本在清代稍有流传。康熙年间彭定求曾于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中挑选部分典籍,辑成《道藏辑要》,可惜不传。嘉庆间,蒋元庭在彭氏辑本的基础上又增益数十种明代《道藏》未收之书,仍名《道藏辑要》,至今颇有传本^②。《道藏辑要》所收《南华真经》一书兼备注文、疏文,其实即据道藏本刊刻而来。嘉庆间阮元收集 175 种《四库全书》未收书进呈嘉庆帝,得御赐“宛委别藏”之名,其中即有“《南华真经注疏》三十五卷”一种,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云:“今依明《道藏》本钞录,为卷三十五。”^③是“宛委别藏”所收《南华真经注疏》亦据道藏本抄成。不过,“宛委别藏”中的抄本至迟在民国时期已经不知所踪,现在仍下落不明^④。

道藏本在日本亦有传抄本。岛田翰曾藏有一部从道藏本录出的《庄子注疏》,其《古文旧书考》云:

秘府《道藏》本者,万历梵夹本,字大如钱……予所获则毛利高标就《道藏》本手钞,而间依别本所校改者,其卷二十九以下则佚。盖秘府《道藏》即高标所旧藏……三十二年(引者按:明治三十二年,1899)孟春,予依秘府《道藏》补钞之,是书复完,亦墨林一佳话也。^⑤

正统《道藏》刻成后,于明清两代陆续印刷,分颁天下宫观^⑥。其后更舶

①详参栾调甫研究道藏本《墨子》时的说法(栾调甫:《墨子要略》,《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1页)。

②赵宗诚:《〈道藏辑要〉的编纂与增补》,《开拓者的足迹:卿希泰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62-68页。

③阮元:《擘经室外集》卷一,《擘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209页。

④袁同礼:《宛委别藏现存书目》,《北大图书馆月刊》1930年第2卷,第5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曾影印全套宛委别藏,其中亦无《南华真经注疏》一种。

⑤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⑥尹翠琪:《传世明〈道藏〉印本的收藏与现状》,《全真道研究》,齐鲁书社,2018年,第148-161页。

载至日本^①,日本宫内省及东本愿寺皆藏有《道藏》^②,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亦藏有《道藏》零本。明代《道藏》化身既多,由道藏本衍生出的版本亦稍夥,下文仅以道藏本为代表进行研究。

除《古逸丛书》本外,魏岷本、道藏本雕版于中国,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则问世于日本(本文总举时称“日系传本”)。日系传本乃根据中国古籍传抄、传刻而来,故先讨论魏岷本、道藏本。

二、魏岷本系统的成立

前人校勘魏岷本时使用的校本不多,故而得出的结论各有偏侧,或认为魏岷本与道藏本关系相近^③,或认为魏岷本与宫内厅本“无甚异同”^④。魏岷本与道藏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魏岷本与宫内厅本是否果真内容相近?为得出更系统的认识,尚需要依靠汇校得出的异文进行深入分析。

(一) 魏岷本与道藏本的同误异文

传世《庄子注疏》各版本之间的异文数量较多,但在分布上却有明显的差异。现以《逍遥游》篇为例,魏岷本与道藏本之间只有7字异文,而魏岷本与日系传本、道藏本与日系传本、日系传本内部各本之间的异文数量几乎都在百字以上^⑤。魏岷本与道藏本之间的异文字数远远少于其他,可知魏岷本、道藏本在《庄子注疏》传本中的版本关系相对紧密。而判定二者是否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更需通过同误异文进行考察。

魏岷本、道藏本同误而日系传本不误的异文不少,在类型上可分为三类。其一,魏岷本、道藏本脱漏疏文。比如,魏岷本、道藏本《齐物论》中共脱漏两段疏文:

1. 魏岷本《齐物论》正文“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两句间无疏文,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何谓朝三”下则有疏文“此假问也”四字。

①横手裕:《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道藏〉的由来》,《汉籍与汉学》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

②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中华书局,2014年,第164页。

③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五,影印清光绪十一年徐承祖聚珍排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蒋门马:《庄子汇校考订》,巴蜀书社,2019年,第284页。

④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一,第143-144页。

⑤各本中唯宫内厅本与足利本之间的异文稍少,但亦有88字,其余各本之间的异文皆在百字以上。

2. 魏岷本《齐物论》正文“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句下无疏文,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则有疏文“夫万物虽多,道通为一,一既一矣,岂有言哉”十七字(“岂有言哉”庆应本作“理无所言”)。

其二,魏岷本、道藏本存在偶然性的无意讹讹。比如魏岷本、道藏本中的“冥”字时常因字形相近误作“宜”字,但又并非书中所有的“冥”字皆误。“冥”字为郭象思想核心所在,王叔岷云“郭之注《庄》,常以‘冥’字会其极”^①,钟泰云“《庄》之言冥,犹《老》之言玄”^②,是故“冥”字于《庄子注疏》全书中的数量较多,今仅以《齐物论》篇为例。《齐物论》注疏中“冥”字凡十六见,如“至于各冥其分”“无心者与物冥”“冥真体道”等;但“各冥其所能”和“与世相冥”两处,魏岷本、道藏本“冥”字作“宜”,日系传本都作“冥”,作“冥”是。再举一例其他篇中的类似异文作为参验:魏岷本《逍遥游》疏“宜于水火则不溺不热”,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宜”作“冥”,是也。“冥”字误作“宜”,是古书常见讹字之例^③;而在《庄子注疏》中,魏岷本、道藏本凡误刻作“宜”字者,则二者必同误。这样的无意讹误难以不谋而合,生动地说明魏岷本、道藏本具有极高的同源性。

其三,魏岷本、道藏本存在相同的臆改致误。《齐物论》正文“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下,诸本之间的疏文颇有差别,从文字相同的角度可将其分为两组:

九窍,谓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谓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也。藏,谓五脏,肝、心、脾、肺、肾也。(魏岷本、道藏本)

九窍,谓眼、耳、鼻、口及下二漏也。六,谓六^④腑也,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也。藏,谓五脏,肝、心、脾、肺、肾也。(日系传本)

魏岷本、道藏本疏文将“舌”归于“九窍”之一,且总释“六藏”与单释“藏”字的意旨又不相合,读来甚为费解。考《黄帝内经·素问·金匱真言论》云“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⑤,正与日系传本的疏文相合,故知当以日系传本为是。魏岷本、道藏本鼻字下臆增“舌”字,“谓六腑”之“谓”误作“藏”,而“胆胃”之“胃”又臆改作“谓”。

根据魏岷本、道藏本之间的同误异文,可知二者的文本在《庄子注疏》的

①王叔岷:《郭象庄子注校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自序”第1页。

②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5页。

③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④中野本“六”误作“天”。

⑤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传本中属于同一系统,而通过其他类型的异文,则能进一步研究魏岷本与道藏本的关系。

(二) 魏岷本与道藏本的文本关系

因版本缺环的存在,魏岷本与道藏本是否存在直接的版本继承关系颇难确定。魏岷本书后刻有魏岷跋文,云“长落宦海,书失之久,楚游,复得于士友,开卷瞭然,如见故人,亟钁诸梓以广其传云。彊圉大渊献(1227)中和节寿春魏岷”,是知魏岷本实据旧本翻刻而来,但此旧本的渊源又是如何,则无法稽考。正统《道藏》所收道书或出自元刊残藏^①,或别有源头^②,道藏本既无序跋,则其祖本亦难追索。但是通过分析魏岷本与道藏本之间的特殊异文,却能够绕开版本缺环的干扰,考察二者文本上的关系。

魏岷本中存在若干墨丁,散布于全书之中,具体位置如下页表1所示(同叶存在多处墨丁者,则重出之以作提示)。

道藏本全书不见墨丁。但魏岷本有墨丁而道藏本对应位置存在文字者只有36处(表中其序号后加*标识),其余64处道藏本并无任何与墨丁对应的文字。道藏本缺少魏岷本墨丁处(下文以□代替墨丁)的文字,时常存在讹误:

NO. 60 魏岷本疏文:“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后知,此是真知。”道藏本作“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后知,此是真知”。宫内厅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墨丁处作“知而不知,非知而知者”,足利本墨丁处作“知而不知,非知而知”。道藏本因脱漏相关内容,“故”字无着,文意令人困惑,据日系传本填补魏岷本墨丁处阙文后,此句疏文方可读通。

NO. 65 魏岷本注文:“况体其□□□性也。”道藏本作“况体其性也”。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处作“体有其”,庆应义塾本作“体用其”(误)。宋代所刻单注本《庄子》存世者凡三种^③,皆作“况体其体,有其性也”,与日系传本相同。

NO. 73 魏岷本疏文:“昔殷汤自翦□□□□是也。”道藏本作“昔殷汤自

①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43页。

②近年来因元刻《玄都宝藏》残叶的陆续发现,学界逐渐认识到正统《道藏》所收道书绝非全然来自元代所刻道藏。如韩吉绍校过元刻《玄都宝藏》所收《云笈七签》残叶后,认为正统《道藏》所收《云笈七签》并不出自元刻《玄都宝藏》(韩吉绍:《〈云笈七签〉版本源流考》,《文史》2021年第4辑,第164页)。

③国家图书馆藏海源阁旧藏《南华真经》十卷(《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涵芬楼旧藏《南华真经》十卷(《四部丛刊》影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黑水城所出《南华真经》十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影印)。

表 1

序号	篇名	卷	叶	序号	篇名	卷	叶	序号	篇名	卷	叶			
1	逍遥游	一	1	35 *	庚桑楚	八	19	69	则阳	八	69			
2			17	36 *			20	70			70			
3			22	37 *			21	71			70			
4			35	38 *			22	72 *			71			
5	35		39	23			73	72						
6 *	达生	七	1	40	徐无鬼		八	24			74	外物	九	73
7 *			2	41				30			75			75
8 *			4	42				33			76			77
9			11	43 *				34			77			77
10 *			19	44 *				38			78 *			79
11	19		45	41				79 *			79			
12	25		46	41				80 *			80			
13 *	27		47	44				81			80			
14 *	31		48	46				82			80			
15 *	32		49	47				83	寓言	十	1			
16 *	36		50	47				84			盗跖			10
17 *	36		51 *	48				85						14
18 *	36		52 *	50				86	渔父		17			
19 *	39		53 *	50				87		51				
20 *	40		54 *	50				88	列御寇	61				
21	50		55	51				89		天下	8			
22	60		56 *	51				90	9					
23 *	61		57	52				91	18					
24 *	68		58	53				92	22					
25	70		59 *	54				93	23					
26 *	78		60	56				94	23					
27	1	61	56	95	25									
28	2	62	57	96	34									
29	3	63	57	97	35									
30	4	64	61	98	51									
31 *	8	65 *	62	99	53									
32	9	66 *	64	100	56									
33 *	13	67	65											
34	17	68 *	66											

翦是也”。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墨丁处作“千里来霖”。按,此事见《吕氏春秋·顺民》,“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翦其发,鄣其手……

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①。

NO. 96 魏岷本疏文:“观察古昔全德之人犹口能备两仪之亨毒。”道藏本作“观察古昔全德之人犹能备两仪之亨毒”。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墨丁处作“鲜”。按,《天下》篇此处正文为“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知日系传本有“鲜”者是也。

魏岷本文句虽然被墨丁隔断,但因有墨丁存在,尚能保留疏文的部分面貌,可为读者提供按图索骥的机会。而道藏本不但文字脱漏,且别无任何标识,离文本原貌愈远。由此推溯,则知道藏本的文本正由魏岷本文本衍生而来,魏岷本文本出现墨丁处,道藏本无法回补者,便删去了事,因此导致相关字句由阙文演变成讹误。

上述判断可于 NO. 90 墨丁处得到旁证。《渔父》“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总”,日系传本下有 16 字疏文:“总,滥也。非是已事而强知之,谓之叨滥也。”魏岷本对应处的疏文仅剩“谓之”“也”三字,其余皆为墨丁(见图 2A)。但依据行款推算,魏岷本此处疏文亦当为 16 字。是知日系传本当接近疏文原貌,而魏岷本的状态则反映疏文在流传时文字已有残脱。道藏本在对应墨丁处自注“原本阙”三字(见图 2B),又与魏岷本一样将“谓之”二字提至句首,因知道藏本所据“原本”必定存在与魏岷本状况相同的阙文。

其事而事之謂之揔疏
也謂之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疏
也謂之
米顧謂之佞也

A 魏岷本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
而事之謂之總
疏謂之原本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強進忠言人不米顧謂之佞也

B 道藏本

图 2

上举校例皆就魏岷本有墨丁而道藏本对应位置无文字者而言。在魏岷本为墨丁而道藏本存在文字的 36 条中,虽确有道藏本与日系传本内容一致者,但道藏本与日系传本存在异文者仍有十条(NO. 6、NO. 7、NO. 8、NO. 17、NO. 19、NO. 24、NO. 31、NO. 36、NO. 66、NO. 80),其中颇有日系传本近真而道藏本则出于人为臆改者,仍可证道藏本晚出,现举两例:

NO. 6 魏岷本疏文:“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丑、命之修短,口及贫富贵贱、愚智穷通,一豪已上,无非命也。”道藏本墨丁处作“奚”,宫内厅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墨丁处无内容(足利本此篇不存)。道藏本之“奚”字

^①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卷九,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00-201 页。

与文意不合。

NO. 80 魏岷本疏文:“夫真理玄妙,绝于言知。若以言詮辯,运知思虑口,适可极于有物而已,未能造于玄玄之境。”其中“运知思虑口,适可极于有物而已”,道藏本作“运知思想,道可极于有物而已”,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作“运知思虑,但极于有物而已”,庆应义塾本作“运知思虑羞,适但极于有物而已”。道藏本追改之粗疏,一望可知。

因为道藏本的文本经过校改,故而现已无法直接判断道藏本是否乃以魏岷本实物为底本刊刻而成。但就魏岷本中的墨丁引起道藏本产生脱文,以及道藏本对魏岷本墨丁进行臆改的现象,仍可知道藏本的文本是以魏岷本文本为基础衍生出的。

三、日系传本的文本特征

日本博士家在写本时代已有传抄中国古籍的行为,渊源自写本时代的家传抄本在后世又受到刻本时代内容的影响^①。这种参合两个时代的文本而新制作出的抄本,既迥异于禹域写本时代的文本特征,又不全同于禹域刻本时代的内容信息。这样的抄本在后世又经传抄、传刻,于是此类文本特点便在日人制作的古书中广泛流布,故而日本传抄、传刻的汉籍,其内容往往自成一系,内部具有一定的文本共性。同时,在日本传承的禹域古籍,因其流传模式在长时间内都以抄写为主,故而每部抄本在被制作时又都会产生与抄写人有关的个性化特点。

这种兼具共性与个性的文本特征,是否亦出现于《庄子注疏》的日系传本中,仍需依靠异文进行分析。

(一)各本的共性文本

判断日系传本的文本是否具有区别于魏岷本系统的共性,首先应以同误异文为依据。日系传本同误异文的数量较魏岷本系统为少,《逍遥游》篇校得两例,《齐物论》《外物》篇则各校得一例:

^①以儒家经书为例,则有《周易》(顾永新:《日系古钞、古活字〈周易〉经注本研究》,《国学研究》2021年总第46卷,第36页)、《尚书》(赵培:《东洋文库藏中原康隆抄本〈古文尚书〉之学派归属——兼论校勘学中“过渡形态”抄本的使用问题》,《文献》2023年第3期,第36-41页)、《论语》《孟子》(高桥智:《日本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3-94页)几种经书的研究成果符合上述观点。以集部为例,则有《白氏文集》(尤其是金泽文库本)的研究成果(静永健:《镰仓与京都——以日系旧钞本之文本异同为中心》,《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可作为参验。

1. 魏岷本《逍遥游》疏：“且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大”误作“夫”。

2. 魏岷本《逍遥游》疏：“亦如荣华本犹滞著，富贵起自骄矜。”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如”误作“须”。

3. 魏岷本《齐物论》疏：“缓、翟二人，亲则兄弟。”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二人”误作“一”。

4. 魏岷本《外物》疏：“姓申徒名狄，姓纪名佗，并隐者。”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并隐者”误于“狄”字下。

日系传本的文本共性，其次体现在扉入旁记字上。日系传本《逍遥游》篇中有两段文字：

文段一：【正文】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文】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此岂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小物必自生于小处，小处亦必生彼小物；理固自然。【疏文】即此鹏鸟，其形重大，若不海中运转，无以自致高升，皆不得不然，非乐然也。

文段二：【正文】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注文】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能令万事理，不理万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疏文】（前略）郭注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说。

魏岷本、道藏本无以上文段中加下划线的28个字。而宋刻单注本《庄子》亦皆无此28字注文。且成玄英疏文在对应处并未疏解“小物”“理万事”之词，是成玄英所见本似亦无此28字。细绎注文意旨，日系传本增多的28字注文实无任何发明，当为将后人旁记字句阑入注文所形成的衍文。

除异文外，在疏文出现的位置，日系传本也偶见与其他诸本不同之处，可作为上述观点的旁证。魏岷本《达生》篇云：

【正文】有孙休者，【疏文】姓孙名休，鲁人也。【正文】踵门而诎子扁庆子，曰：“休居乡不见谓不修……天哉，休恶遇此命也？”【疏文】踵，频也。诎，告也、叹也。不能述道而怨迍遭，频来至门而叹也。姓扁名子庆，鲁之贤人，孙休之师也……

道藏本同。但宫内厅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却将加下划线的两段疏文合并置于正文“踵门而诎”的“诎”字之下（足利本此卷不存）。虽然两种放置疏文的方式皆无损文意，但这一现象仍足见日系传本的疏文位置也有迥异于魏岷本系统的共性。

以日系传本内部的同误异文为据，结合日系传本误增同一内容的旁记信息、归总同一段疏文等现象，可知日系传本应有共同的文本源头。

(二)各本的个性异文

日系传本内部也存在不少异文,其中绝大多数是其中一种有别于其他三种的个性化异文。整体而言,宫内厅本、足利本抄写质量较好,庆应义塾本、中野本的无意错讹数量较多,庆应义塾本甚至频见窜句脱文现象,可读性最差。但若具体到微观的字句异文上,四种日系传本的个性化异文实各有优长。

有宫内厅本独是者:魏岷本《让王》疏文“欲召之为相,故遣使人赍持幣帛,先通其意”,道藏本、足利本、中野本、庆应义塾本同;宫内厅本“使”下更有“使”字。正文“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帛先焉”,则疏文凡作“遣使人”者,皆不辞。宫内厅本“遣使”属上读,“使人”属下读,与正文意合。

有足利本独是者:魏岷本《外物》疏文“蹄,兔置也,亦兔彊也”,道藏本、宫内厅本、中野本同;足利本“彊”作“弼”,庆应义塾本“彊”字处空格。陆德明《庄子释文》出“蹄”字,云:“兔置也,又云兔弼也。”^①《集韵》引《字林》“弼,以弓置鸟兽”^②。则知足利本是。

有庆应义塾本独是者:魏岷本《外物》疏文“妻曰,受人有者,必为人角制,而之不能为人制”,道藏本同;宫内厅本作“妻曰,受人禄者,必为人用制,而之不能为人制”,足利本作“妻曰,受人禄者,必为人用制,今妻不能为人制”,中野本作“妻曰,妾闻受人禄者,必为人用制,而之不能为人制”,以上诸本皆不辞。庆应义塾本作“妻曰,妾闻受人禄,必为人所制之,妾今不能为人制之”,文意显豁。

有中野本独是者:魏岷本《说剑》疏文“试陈剑士,使考教使断,以定胜劣”,道藏本同;宫内厅本作“试陈剑士,使教决断,以定胜劣”,足利本作“试陈剑士,使考校决断,定胜劣”,庆应义塾本作“试陈剑士,使考校决断,以定胜劣”,以上诸本皆不辞。中野本作“试陈剑士,使剑决断,以定胜劣”,与正文“今日试使士敦剑”相合。

四种日系传本皆存在独是的异文,说明四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抄写关系。庆应义塾本、中野本的个性化异文较多,利用相关异文,更能对二本的文本来源单独进行深入分析。

1. 庆应义塾本与魏岷本系统的亲缘关系

在四种日系传本中,庆应义塾本的个性化异文最多。以《外物》篇为例,

①陆德明撰,黄华珍校:《日藏宋本庄子音义》,影印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魏岷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1页。

②丁度:《集韵》卷八,影印南宋初年明州刊本,文物出版社,1993年,叶十八。

在四种日系传本内部,宫内厅本共有 6 字个性化异文,足利本 15 字,中野本 32 字,而庆应义塾本个性化异文的数量极为突出,达 109 字。在这 109 字的个性化异文中,又有 55 字与魏岷本系统相同,其中甚至有 7 字是与魏岷本系统同误的,见表 2(并附 3 例与魏岷本同不误者):

表 2

序号	魏岷本系统、庆应义塾本	其余三种	序号	魏岷本系统、庆应义塾本	其余三种
1	所以佯狂	佯作佯,是	6	目带桑中之色	带作滞,是
2	洪波際日	際作隐,是	7	风采情高	情作清,是
3	督其异常	督作怪,是	附 1	此是逸诗久遭删削	久误作又
4	遣汝身之躬饰	之下不衍躬字	附 2	田恒资仁义以窃齐	恒误作桓
5	家被覆没	家作蒙,是	附 3	闻尧之美	尧之二字倒

上述 7 例庆应义塾本与魏岷本系统同误的异文,均为形近产生的无意错讹。而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在《外物》篇中总共有三处同误异文(附 1-3),庆应义塾本却皆不误。结合庆应义塾本个性化异文近半与魏岷本相同的现象,可知庆应义塾本的内容应是以魏岷本系统文本为基础,并参酌与其余三种日系传本同源的文本形成的。继续推溯,则又有二端可以表出:

其一,庆应义塾本所利用的魏岷本系统文本,应与道藏本相近。庆应义塾本题“南华真经注疏”,与道藏本同;而其余三种日系传本皆题“南华真经注疏解经”。就异文而言,亦能发现少量同误异文,可以说明庆应义塾本与道藏本的密切关系:

①魏岷本《外物》疏文“则天地大絃”,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同;道藏本、庆应义塾本“絃”误作“絃”。

②魏岷本《庚桑楚》疏文(表 1 NO. 37)“自彼两忘,视人若己,不口人者己外,何辞谢之有乎”,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处作“亢”;道藏本、庆应义塾本墨丁处误作“允”。按,《应帝王》正文为“而以道与世亢”,疏文:“汝用文言之道而与世间亢对。”则知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处作“亢人”者是也。

其二,其余三种日系传本与魏岷本系统的关系,皆不如庆应义塾本之密切。在《外物》篇中,宫内厅本的个性化异文仅有 1 字与魏岷本系统相同,魏岷本《外物》疏文“东方作,谓天曙日先起”,道藏本、宫内厅本同;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先”作“光”,是也。此例同误异文说明宫内厅本与魏岷本系统也有一些渊源,但就数量及占比而言(宫内厅本 1/6,庆应义塾本 55/109),宫内厅本与魏岷本系统的亲近程度要远逊于庆应义塾本。

中野本《外物》篇的个性化异文亦有1字与魏岷本系统相同,魏岷本《外物》疏文“謚,急也”,道藏本、中野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謚”作“弦”。不过,此句疏文所释正文作“謚”(诸本无异文),颇疑中野本与魏岷本系统皆照本改字,因此不谋而合。

而足利本《外物》篇的个性异文则完全没有与魏岷本系统相同者。

2. 中野本源出抄本补证

中野本是典型的江户刻本,但在早于江户刻本之前的五山版中,日本人就有根据本土流传的旧抄本雕版出书的习惯^①。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说:“日本万治间书坊有刊本(引者按:即中野本),分为三十三卷,其中多俗讹字,盖从古钞本出。”^②如何由俗讹字认定中野本出自旧抄本,杨氏并未详谈,今予以补说。

中野家族为日本京都地区自产自销的书商之一,传承有年。中野家族开办的书肆刻有不少医书、佛道经典、俗文学书籍。中野小左卫门的兄长中野市右卫门,更被称为京都书肆之祖^③。日本书肆刻书因限于学识,往往误翻抄本常用俗字以致讹误。此类异文可用以推想中野本的文本来源,此殆即杨氏所谓“俗讹字”。此类文本甚多,略举两例以揭示现象:

①魏岷本《逍遥游》注:“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宫内厅本、足利本、道藏本、辑要本、《古逸丛书》本同;中野本“事”误作“受”。

②魏岷本《逍遥游》疏:“菌则朝生暮死,蝉则夏长秋殂。”宫内厅本、道藏本、辑要本、《古逸丛书》本同;足利本“长”作“生”,“殂”作“死”,中野本“夏”误作“复”。

“事”字时有因受小篆字形影响而手书作“𠂔”者,宫内厅本、足利本“事”字即多写作“𠂔”,中野本盖将其底本的“𠂔”字形误认作“受”而致误。“夏”字亦有写作“𠂔”字形的情况存在,宫内厅本、足利本即写作“𠂔”,中野本也当因形近而将底本“𠂔”字误刻作“复”。

再举杨氏未叙及的一种异文作为旁证。在制作写抄本时,抄手因不仔细而于行间漏抄的文字,发觉后则或将脱字补于当行之末,或缀在注文之尾^④。而作为刻本的中野本,却正有此种写抄本的书写特征:

①魏岷本《逍遥游》注文:“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道

①刘玉才:《日本古钞本及五山版汉籍对于中国文献学研究的意义》,《日本古钞本及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序言”第3页。

②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

③柏崎顺子:《江户版以前の出版界》,《言語文化》2017年第53期,第36-41页。

④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16-317页。

極耶鵬之自，上以觀地，亦若入之自，此觀天，則止而
圖南，空言鵬，不知道里，遠近，輒足，以自勝，而逝之，疏

A

致其在最乎而呼，鵬為虫，太戴礼云：東方，麟蟲三百有
六十，而南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其長，而

B

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問，故云是已
所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大池也，有黑焉，其廣數千里

C

图3

藏本、宮內厅本、足利本同；中野本“里”下脱“之”字，“逝”字下有“之”字（“逝”字位于此段注文之末，见图3A）。

②魏岷本《逍遙游》疏文：“而呼鵬為虫者，《大戴礼》云‘東方麟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道藏本、宮內厅本、足利本同；中野本“虫”下脱“者”字，“三百”下多“有”字（“虫”“有”二字同處一行，“有”字在此行行末，见图3B）。“有”字當為“者”訛字）。

③魏岷本《逍遙游》疏文：“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道藏本、足利本同；宮內厅本“已”作“也”，中野本“許”下脱“所”字，“已”下有“所所也”三字（“已”字位于此段疏文之末，见图3C）。

以上諸例均可見中野本照本湊刀時之機械，也可從側面說明中

野本忠實於底本，其文本能保存日人旧抄本之仿佛。

四、《古逸丛书》本校议

《莊子注疏》的傳本可根據文本的相似性劃分為魏岷本系統與日系傳本兩類，以此為基礎便可對最晚出但卻最為通行的《古逸丛书》本進行研究。《古逸丛书》本題“覆宋本莊子注疏”，所“覆”宋本即為魏岷本，但近年來學者已經陸續指出《古逸丛书》本並未忠实地覆刻魏岷本。

長澤規矩也是較早關注此問題的學者，長澤氏曾列舉九條校記，用以證明《古逸丛书》本與魏岷本的內容有異^①。隨後馬月華、方勇也提出《古逸丛书》本並非原樣覆刻魏岷本^②。然而學界目前對於《古逸丛书》本“覆刻”部

①長澤規矩也：《古逸丛书的信凭性について》，《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冊，汲古書院，1982年，第500-502頁。

②馬月華：《〈古逸丛书〉研究》，第139頁。方勇：《莊子纂要（增訂版）》，學苑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1-2頁。

分的校改方法与水平尚未及探讨。而鉴于《古逸丛书》本在近现代以来《庄子》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新刻部分的文本来源问题亦值得深入考察。

(一)《古逸丛书》本“覆刻”部分的校改方法

魏岷本书后有杨守敬跋语:“黎公乃从旗山借此本,以西洋法影写而刻之,其所缺之卷,即据坊刻本集宋本之字以成之……道藏、坊刻(引者按:即中野本)互有短长,宋本(引者按:即魏岷本)亦多讹字,余据三本,择善而从,庶乎可读矣。”杨守敬言“余据三本,择善而从”,可知他曾以中野本、道藏本校过魏岷本。《古逸丛书》本中确有相关异文可证实杨氏此言:

1. 魏岷本《逍遥游》疏文“未能无所不乘,故不可一时用也”,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古逸丛书》本“用”作“周”,庆应义塾本“用也”作“周”。

2. 魏岷本《逍遥游》疏文“四生杂沓,万类参差”,道藏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同;宫内厅本、中野本、《古逸丛书》本“类”作“物”。

3. 魏岷本《山木》疏文(表1 NO. 17)“既□无终与始,则无死与生”,道藏本、《古逸丛书》本墨丁处作“其”;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墨丁处作“天”。

4. 魏岷本《山木》疏文(表1 NO. 19)“何往而不□爱重哉”,道藏本、《古逸丛书》本墨丁处作“得”;宫内厅本、足利本、中野本墨丁处作“迎”,庆应义塾本墨丁处作“逆”。

从前两例异文可知,《古逸丛书》本曾依据中野本校改魏岷本。而从后两例《古逸丛书》本补刻魏岷本墨丁的现象可知,《古逸丛书》本在刊刻时还以道藏本为参考。《古逸丛书》本的校改已经使得本属于魏岷本系统的文本受到日系传本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古逸丛书》本还时常捏合两类文本,试图改造旧说:

1. 魏岷本《逍遥游》疏文“大言不合于理耳”,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合”作“入”,“理”作“里”;《古逸丛书》本“理”作“里”。

2. 魏岷本《齐物论》疏文“麋鹿更相挠,泥鳅与鱼游戏”,道藏本同;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挠”作“交接”;《古逸丛书》本“挠”作“接”。

上述校改虽出臆断,但毕竟尚能保留部分版本依据。更有甚者,《古逸丛书》本还存在并无其他版本依据的异文:魏岷本《逍遥游》疏文“浮风不崇高,大翼无由凌汉,是以小鸟半朝决起,枪榆之上”,道藏本、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同;《古逸丛书》本“汉是”作“霄汉”。《古逸丛书》本盖据下段疏文“上负青天,下乘风脊,一凌霄汉,六月方止”一句而改底本。

足见杨守敬的“校勘”不仅在魏岷本、中野本、道藏本三者间“择善而从”，更根据版本异文及上下文新造文本。这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校是非”的“校勘”，而是一种“考证”。

而杨守敬的“考证”成果，难称一定不易。在上举校例中，魏岷本系统之“大言不合于理”，日系传本系统之“大言不入于里”，本来义可两通而不必遽改^①。但《古逸丛书》本却于两类文本中各取一字，新造为“合里”。《古逸丛书》本号称“覆宋”，至少应当在魏岷本篇卷完整的部分保存其面貌，但实际上却因融入杨守敬的主观学术成果，致使《古逸丛书》本的面貌已失魏岷本之真。

（二）《古逸丛书》本新刻部分的文本来源

魏岷本在《古逸丛书》刊刻时，卷三至卷六已经不存，卷二的部分叶面也已经散佚。黎庶昌因故在《古逸丛书·叙目》中表示，针对魏岷本已散亡的叶面，《古逸丛书》本将以中野本为依据，仿照魏岷本的字体雕刻上版，来补足全帙。杨守敬在魏岷本的跋语中评价此事云：

（黎庶昌）乃谋之旗山，欲得其本上梓。旗山则以为先世手泽所留，虽千金不售。夫以五六册残书云“千金不售”，可谓至奇；而其坚守先业，亦可谓至笃。黎公乃从旗山借此本，以西洋法影写而刻之，其所缺之卷，则据坊刻本集宋本之字以成之。夫以西法影照刻书，前世未闻；而集字成书，尤为异想。此与新见氏抱残篇如拱璧者，可称双绝。

杨守敬虽对黎庶昌仿魏岷本字体的新刻之举暗自表达不满，但黎庶昌以中野本作为新刻部分的文本依据之说在杨守敬处亦得以印证。然而《古逸丛书》本在“覆刻”宋本时除中野本外，还参考过道藏本的文本，这一举动是否延续至新刻部分？回答此问题，亦需以异文为据。

以《古逸丛书》本新造的《马蹄》篇为例。其中《古逸丛书》本与中野本同而与道藏本不同的异文共有 19 条；而《古逸丛书》本与道藏本同而与中野本不同者则有 35 例，今举两例：

1. 《古逸丛书》本“莫往莫来，桥于是乎废”，道藏本同；中野本“乎废”作“废乎”。

2. 《古逸丛书》本“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离，何劳检迹。是知和心、检迹由乎道丧也”，道藏本同；中野本“和心”作“义和”。

可见，除中野本外，道藏本也是《古逸丛书》本新刻部分的文本来源之

^①日系传本疏文之“入里”，盖即化用《天地》篇正文“大声不入于里”（诸本无异文）一句而来。

一。甚至就《马蹄》篇而言,道藏本才是主要的文本依据。黎庶昌与杨守敬着重强调《古逸丛书》本在新刻部分中对中野本的利用,淡化道藏本的存在,是不负责的。

《马蹄》篇中还有三条异文,《古逸丛书》本与诸本皆不同,当为《古逸丛书》本校改,今条举如下:

1.《古逸丛书》本“夫殉物邪僻为小人,履道方正为君子”,道藏本、宫内厅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殉”作“徇”。

2.《古逸丛书》本“踉跄恃裁非之义,蹇蹇夸偏爱之仁口,澶漫贵奢淫之乐,摘僻尚浮华之礼”,道藏本、宫内厅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墨丁处作“为”。

3.《古逸丛书》本“軛,义马颈木也”,道藏本、宫内厅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义”作“又”。

《古逸丛书》本《马蹄》篇的校改成果并未尽善。以第三条为例,刘熙《释名·释车》云:“軛,扼也,所以扼牛头也。马曰鸟啄,下向,又马颈,似鸟开口向下啄物时也。”^①陆德明《庄子音义》出“衡扼”,亦云:“扼,又马颈者也。”^②是成疏之作“又马颈”,渊源有自。《古逸丛书》本改作“义”,致使疏文传承古本旧文的现象湮灭不存。

总之,《古逸丛书》本无论是“覆刻”还是新刻,本质上都是捏合魏岷本系统,与在日系传本中内容质量不高的中野本,所新创的一部《庄子注疏》读本。《古逸丛书》本可读性虽然高于以往的《庄子注疏》版本,但是其中有些文本体现的思想已经不能归属于《庄子》正文、注文和疏文的原作者。就学理而言,《古逸丛书》本校改的新结论更不乏可商之处。该本不但没有撰写考证、校记,甚至在题“覆宋”之后又对校改所据版本与校改方法讳之再三,使得后人时常将此新出的读本当作古本看待,将《古逸丛书》本自创的内容当作古说加以徵引^③。

①任继昉:《释名汇校》,齐鲁书社,2006年,第417-418页。

②陆德明撰,黄华珍校:《日藏宋本庄子音义》,第91页。国图藏宋刻《经典释文》“颈”作“颞”,余与魏岷本所附《音义》同;《续古逸丛书》影印涵芬楼旧藏郭注附释文本《庄子》所载音义亦与魏岷本所附《音义》全同。

③《故训汇纂》“小”字下引成疏“夫殉物邪僻为小人”(宗福邦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34页),盖就《古逸丛书》本逐录。闻一多先生《庄子章句》于《马蹄》篇云:“軛,义马颈木。”(《闻一多全集》第9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此殆亦就《古逸丛书》本疏文为据而得出的认识。

五、结语

雕版于南宋的魏岷本是合编《庄子》正文、郭象注文、成玄英疏文而成的《庄子注疏》存世的最早刻本,其中偶见留待后世补苴的墨丁。根据魏岷本、道藏本存在大量同误异文的现象,结合道藏本因径直删去魏岷本墨丁而致误的内容,可知道藏本的文本正是由魏岷本的文本衍生而来。

宫内厅本、足利本、庆应义塾本、中野本四种日系传本的内容既有共性又存在个性,符合日本旧抄本的文献特征。就共性而言,日系传本的同误异文多为无意错讹,且数量不多,内容质量较魏岷本系统为高。就个性而言,日系传本各有优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传抄关系,庆应义塾本与魏岷本系统的关系较为密切,中野本虽为江户刻本,但源出另一部日本旧抄本,文字多存抄本旧貌。

黎庶昌宣称《古逸丛书》本是以魏岷本为底本进行“覆刻”,魏岷本残缺的内容则取自中野本新刻补全。但实际上,覆刻、新刻部分皆有源出道藏本、中野本的内容,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臆改。《古逸丛书》本的可读性较好,但有些论述已非古人之意。

【作者简介】丰子翔,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